

族群网络与跨界发展 ——当代香港福建籍政商企业家的人类学研究

袁建伟

(绍兴文理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浙江 绍兴 312000)

摘要: 在中国经济动力的推动下,华人商业不断拓展全球与区域的生产网络,带有重要的跨国特征。从系统论和过程观的视角,以中国人海外发展的眼光,重新审视当代香港福建华人跨界创业与族群网络构建的内外部原因与发展动力,可以发现,香港福建华人企业家的跨界移民经验与他们的成长创业密切相关。福建华人企业家凭借在族群网络与社团组织中建立的领导地位,进行跨界创业,参与当代香港的政治经济转型。通过强化自身的族群网络,福建华人企业家发展了跨界政治经济参与能力,提升了在中港两地的社会地位与政治地位。当香港回归中国,成为中国的一个国际城市之时,福建华人企业家带有族群色彩的资本与商业网络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福建华人企业家与东南亚华人族群资本的天然联系以及同中国政府的沟通能力,提升了他们在香港商界社会的影响力。他们利用地缘认同、华商群体与社团组织等具有鲜明族群色彩的网络关系,在中国与香港的政治经济变迁中,成功地构建了跨越族群界限的政商关系网。

关键词: 族群网络;跨界发展;福建华人;政商企业家;跨界移民;香港

中图分类号: C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33X(2014)01-0060-06

在跨国主义理论视野下,华人移民的经济理性与文化理性在移民发展过程中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对于华人跨国移民而言,要从移民发展与跨国劳动力人口流动的角度,来重新看待他们建立在故乡、文化、家庭、道德与血缘之上的族群网络。跨国主义理论有关移民研究最大的贡献在于,将移民流动和移民发展、移民居住国与移民来源地的政治经济互动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考察。从系统论和过程观的视角,才能够以中国人海外发展的眼光,重新审视华人跨界创业与族群网络构建的内外部原因与发展动力。本文关注在海外华人商业资本、移民网络与中国国家和地方发展互动的过程中,香港福建华人企业家的族群网络是如何通过政商互动,嵌入到中国情景当中,并突破其局限性,实现跨界发展。

一、族群网络与华人企业家的跨界适应性发展

McKeown Adam 认为,近代以来的华人跨国移民发展,深受侨乡所在地与移民定居地之间跨国政治经济、文化互动的影响^[1]。Ong Aihwa 认为,在亚

太发展的场景之下,要关注跨国移民行动的文化逻辑与政治经济过程之间的联系,以及这种联系如何影响了移民的家庭生活与身份认同^[2]。“可适应的身份”理论^[3]关注移民族群在不同国家疆界之间发展时对于族群身份与国籍身份的选择,是其经济理性与适应性生存策略的一部分。在跨国移民发展的理论背景之下,华人跨国主义的人类学民族志展现了中国人海外发展的经济理性、组织基础与文化纽带。徐元音书写广东台山籍移民在美国与华南之间跨国发展的民族志^[4],关注了华人移民利用在美国积累的财富与专业知识,通过修建铁路推动广东地方现代化的努力。当代福建人在欧洲的海外发展过程中,华人社团在社区发展与跨国网络的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5]。柯群英描述新加坡柯姓宗族在福建安溪重建侨乡联系的民族志^[6],表明族群文化与族群认同是跨国华人网络形成的重要纽带。

Portes 等人的论文^[7]提出,要从移民经济适应的视角,来看待跨国企业家的社会网络与跨国商业

收稿日期: 2013-09-27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青年基金项目“族群网络与专业网络——香港、上海、福建之间的跨界华人企业家成长研究”(11YJC840063)。

作者简介: 袁建伟,男,绍兴文理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商业人类学与民营企业公司治理。

E-mail: yuanjianweihku@126.com

实践。Portes and Alex 的社会学著作^[8]表现了大量古巴跨国移民的涌入和定居,使处在社会主义古巴与资本主义美国之间的迈阿密城,发生了经济和社会的双重变迁。在这部作品中,古巴籍的华人移民企业家利用族群联系与跨国网络,不仅使其企业成功地融入到迈阿密的城市经济当中,而且通过政治参与和游说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自身族群在美国的政治地位。同样,韩起澜(Hong Emily)描写苏北人在上海的民族志^[9]中,族群网络对于在上海备受歧视的苏北移民的生存发展,有相当重要的帮助。族群网络不但帮助外来的苏北移民能够在上海立足谋生,也使得他们中的精英分子能够在某一行业中拥有领导地位。族群认同与族群网络构建的背后,隐藏着群体经济利益与政治诉求。地缘性组织与行业性组织是族群网络构建与发展的基础。在对上海华人社会社团组织的研究中,顾德曼(Goodman Bryna)认为,故乡、国家、民族主义与华人移民的地缘性网络和族群身份认同密切相关。当族群组织与社团组织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与发展时,移民的行动策略与所表达的公共诉求,对于社会变迁有显著的影响作用。移民企业家精英往往凭借族群社团领导人的地位,来构建他们企业与个人的政商网络与跨族群关系^[10]。

面对社会变迁与国家地方社会互动,华人企业家必须采取跨族群合作的开放态度。在遭遇华人网络关系之时,无论是西方与日本的大企业,还是中国的民族资本家,都必须以理性与现实的态度,采用跨界合作与适应性策略。高家龙(Corchran Sherman)对于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研究也表明了,在华人企业家创业过程中,超越族群网络局限的跨界发展是充满痛苦但又必须进行的理性选择。华人类群网络内部具有排他主义的特点,但面对商业环境与政治环境的考验时,又必须作出现实主义的抉择^[11]。在现代中国与东南亚互动的商业史中,华人企业家并不是单纯的“文化中介人”,而是具有主动性和创造性,游走于政商之间,跨越国家疆界的商业消费文化创造者。东南亚民族国家背景之下,华人企业家作为少数族群企业家不得不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通过与当地精英的联盟合作,来实现适应性生存。他们的跨族群合作网络嵌入到当地的政治经济情景当中,并随着当代东南亚的政治经发展而发生改变。高家龙(Corchran Sherman)聚焦中国与东南亚医药市场上的华人企业家,展现了他们如何创造新的消费文化,并使其延伸到地方、国家与跨国层面^[12]。

现代东南亚华人大亨胡文虎的万金油帝国与星岛报业的崛起,不仅借助了客家人的族群网络,也借助了现代传媒手段与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参与。在跨国商业实践中,族群网络与跨界联盟对于华人企业家的成长与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在整个 20 世纪,在中国之外的华商为了商业目的,开始逐步适应西方公司结构,并在此基础之上,通过组织创新来发展和保持个人网络,从而不断地积聚财富。“他们从英国或者其他欧洲殖民者那里学到了公司机构的组织方式。殖民者的法律促使他们很早地适应到亚洲二战后的企业组织形式与开放的经济体制当中。华人企业家快速地将建立起的个人网络拓展到他们各自的控股公司当中,从而形成了具有东亚特色的华人大企业关系网。”^[13]

在中国经济动力的驱使之下,华人商业不断拓展全球与区域的生产网络,并且带有重要的跨国特征。跨国移民企业家带来的资本与人才的双向流动与互动发展,有时会超越侨乡地方的局限,对国家层面的产业升级与技术提升产生影响^[14]。华人类群文化的一致性与均衡性进一步强化了华商在大中华地区商业网络的优势地位^[15]。在国家与市场之间,考察华人的族群关系与商业网络的发展趋势,要从历史渊源、空间发展、制度建设与发展局限性入手^[16]。对于中国人海外发展这个宏大主题,要从东亚地区经济贸易发展、跨国华商网络形成、中国沿海经济社会变迁与国家政策影响等方面入手,进行综合性的研究考察^[17]。不同区域之间的经济协作与跨国企业商业网络的活动密切相关。华人企业家的族群网络,在促进中国与东南亚之间跨境投资方面起着积极的作用。建立在族群网络之上的华人跨国商业网络,在亚太经济整合当中,以非正式的机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8]。Dahles Heldi 的研究表明,新加坡华人企业家通过构建以文化和故乡联系为纽带的族群网络,为企业在中国的商业项目拓展,提供了跨越政治体制差异的发展空间^[19]。戈德利·迈克尔(Godley, Michael R.)关于南洋华侨企业家参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著作,其学术价值常常被忽略。这部作品不仅表明了满清政府在自强运动时期对于海外华人企业家经济资本与专业知识的需要,也表明以张弼士为代表的华人企业家主动参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努力。这不仅是海外华人资本在东亚地区崛起的案例,更是东南亚华人企业家利用南洋资本打通政商网络,在近现代中国回流发展的典型案例^[20]。

二、香港的后殖民转型与当代福建华人政商精英的崛起

香港自开埠以来就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与商贸优势成为一个亚洲网络社会。作为中国沿海华人的第二故乡,香港一直是中国与东南亚之间华商网络的核心环节。在英国殖民政府积极不干预(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政策影响下,香港形成了多元文化社会与崇尚创业的商业文化环境,孕育和发展了发达的商业网络和具有政商企业家特点的华人精英。薛凤璇与黄绍伦的研究,首次注意到了香港工业化进程中福建籍中小型企业家的创业发展历程^[21]。福建族群是继广东族群之外香港本地最大的族群团体。香港福建社团是福建籍移民保持与中国和东南亚故乡文化与商业联系、情感诉求及文化认同的重要志愿性团体^[22]。近30年来,香港福建社团也经历了由旅居者同乡会到香港本地主流社团的演变历程。20世纪80年代初,香港的华人族群在香港、中国大陆与东南亚之间,开始了重建商业资本与文化网络的过程^[23]。在中国内地与香港之间,这批华人跨界移民企业家整合资源谋求发展^[24]。香港福建籍政商企业家的成长与香港回归前后的政治经济发展密切相关。香港前中央政策组主任顾汝德(Goodstadt Leo)指出,在准备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期间,中国政府决定培养与扶植在后殖民政治中能够发挥作用的个人与团体^[25]。在香港与中国内地的政治经济融合过程中,当代香港福建籍政商企业家的族群网络、社团地位与影响力,日益得到了强化和发展。在1997年后的香港后殖民转

型期间,这批支持中国发展、拥护香港回归的华人企业家,成为新一代的香港政商精英^[26]。

三、一国两制背景下的香港福建华人企业家的跨界创业与政商发展

1. 跨界移民经验与香港福建华人企业家的成长。本文中所考察的当代香港福建籍政商企业家,直接继承了他们父辈在东南亚的移民经验与商业冒险精神。他们都是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出生在福建泉州侨乡的华侨子弟。他们的童年教育深受福建地方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70年代菲律宾排华运动阻断了他们与父辈团聚的东南亚移民之路。他们大多和母亲一起滞留在香港的福建人社群,成为香港社会的外来新移民。中文教育的背景使他们一方面保持了与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化和政治联系;另一方面,被排除在英国殖民地香港的主流社会之外。边缘化的社会地位、受歧视的族群身份与政治背景阻断了他们进入香港大学和成为政府公务员的道路。华人家庭的商业背景与跨国族群网络为他们在70年代的创业提供了资本来源和市场机遇。他们在香港的成长,同时受到了华人关系网络的影响与西方跨国企业科层体制的严格训练。他们凭借来自家族和东南亚的族群资本支持,成为香港工业化过程中的中小型企业家。往来于香港和亚太市场之间,他们很快开拓了海外市场,融入了跨国制造业产业链。随着8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的启动与香港回归的日益临近,这批香港福建籍工业家开始重建与中国的商业与政治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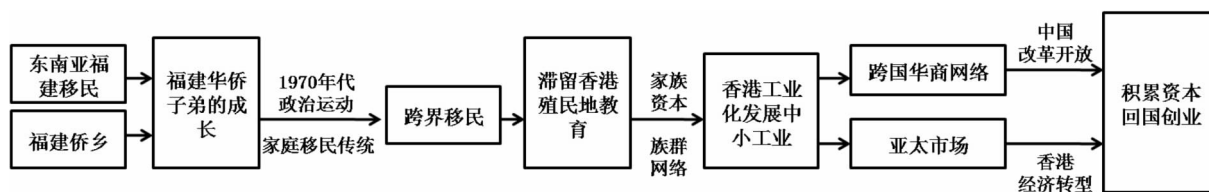


图1 跨界经验与香港福建华人企业家的成长

2. 福建华人企业家的族群资本与回国创业。改革开放后,香港福建籍华商回国创业的资本主要有三个来源。第一,来源于他们在香港、东南亚和亚太其他地区项目投资的收益。第二,来自香港与东南亚的福建华商族群网络资本。第三,来源于香港与内地的资本市场。在开始阶段,香港福建籍华商在珠三角地区与福建省对接全球制造产业链,参与地方经济开发。在纺织业、服装业与玩具制造业,他们凭借中国制造的优势,与国际品牌建立代工关系,拓展了国际市场。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他们凭

借政府政策支持与华人资本优势,在福建侨乡进行工业园区的开发与建设。同时,他们将资本积累投入到中国内地的房地产开发当中。在工业地产领域积累的专业经验与政府资源,使他们在住宅地产与商业地产的发展当中占有先机。香江国际集团的杨孙西将香港中环的开发理念引入到北京的中央商务区,发展了以财富中心为代表的商业地产项目。许荣茂以世贸广场与滨江花园模式,在上海及长三角地区发展高端商业地产与住宅产品。黄如论专注于世纪金源大型住宅项目开发,创立了从北京到中国

内地二三线城市的造城开发模式。香港福建籍政商企业家在中国内地房地产开发领域的跨界发展,一方面得益于他们族群网络与族群资本的支持;另一

方面,也借助于他们整合政商资源,利用中港两地的资本与跨界沟通的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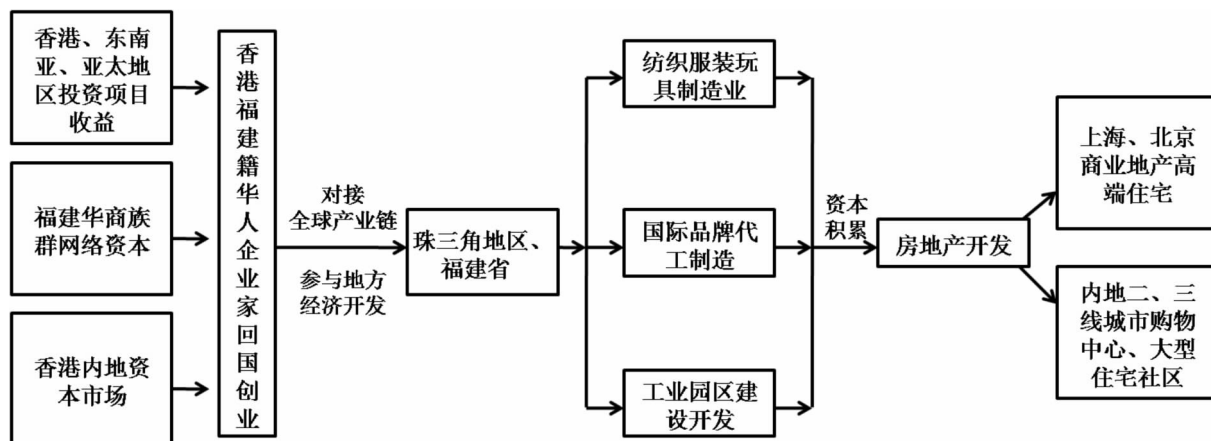


图2 福建华人企业家的族群资本与回国创业

3. 一国两制背景下香港福建籍企业家的政商发展路径。新一代福建华人政商企业家的成长,与其在一国两制背景下的族群网络发展和跨界实践密切相关。对于香港福建籍政商企业家的人类学考察,要将其嵌入到香港与中国大陆近30年的政治经济转型与社会变迁当中。改革开放、香港回归、一国两制,构成了中港两地政治经济变迁的主线。中国自上而下的市场经济发展,推动了地方政府针对海外华人招商引资的热潮。香港福建籍华人企业家同时具有海外华侨与港商的双重身份,他们与东南亚的华人资本有着密切的族群联系,因而成为地方政府招商引资优先支持和争取的对象。在香港回归前后中英双方的政治经济角力过程中,中国政府针对香港商界实行了强有力的统一战线政策。在中国大陆的不断投资,使他们家族的商业利益与中国的发展息息相关。香港福建华商成为一国两制的忠实拥护者。香港回归前后中国国家力量的介入,推动了福建传统族群社团的进一步整合。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随着香港后殖民政治的发展,福建族群社团作为主流建制派的影响力得到进一步凸显。福建籍政商企业家立足强化自身的族群网络,发展了跨界政治经济参与能力,提升了自身的社会地位与政治地位。这种超越族群网络局限的跨界政商拓展,使他们的企业从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沿海侨乡地区,发展到北京、上海这样的中国政治经济中心区域,进而深入到中国内地。在这种跨界发展的过程当中,香港福建籍政商企业家的族群网络成功地嵌入到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当中。

4. 香港福建籍政商企业家的跨界创业与创新。中国经济的崛起带来了两大市场契机:一是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二是中国内地房地产市场迅猛发展。植根于香港制造业,熟悉国际制造业产业链的香港福建籍企业家,较早地布局中国大陆,建立国际代工生产体系。香港福建籍政商企业家在内地创办的工业企业,发展出了先进的供应链管理。凭借爱国港商与侨商的双重身份与政府资源,香港福建籍政商企业家将工业与商贸的利润投入到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房地产市场当中。经过近20年的发展,他们成为中国领先的福建籍房地产财团。他们的跨界发展突破了福建侨乡地域的局限,进入到北京上海,成为主流的房地产开发商。他们将房地产开发领域成熟的香港经验与专业知识,应用到中国大陆的房地产开发领域。从社区改造到都市整体开发重建,从高端住宅、写字楼到购物中心,他们的房地产开发模式成功地植入到当代中国的都市化进程之中。在中国内地的商业项目开发过程中,香港福建籍政商企业家表现出高度的政策敏感度与对市场机遇的把控能力。他们非常善于利用海外华人类群的商业力量与影响力,与地方政府就项目发展取得共识。在跨界发展过程中,这些政商企业家对国家政策与项目开发有很好的对接能力。他们对当地环境与国际经验有较强的知识嫁接能力。香港福建籍政商企业家,在强烈的企业家精神驱动下,表现出很强的地方适应性。他们以内部信任为纽带,通过族群网络进行联合投资,抱团发展,敢于冒险,注重政商结合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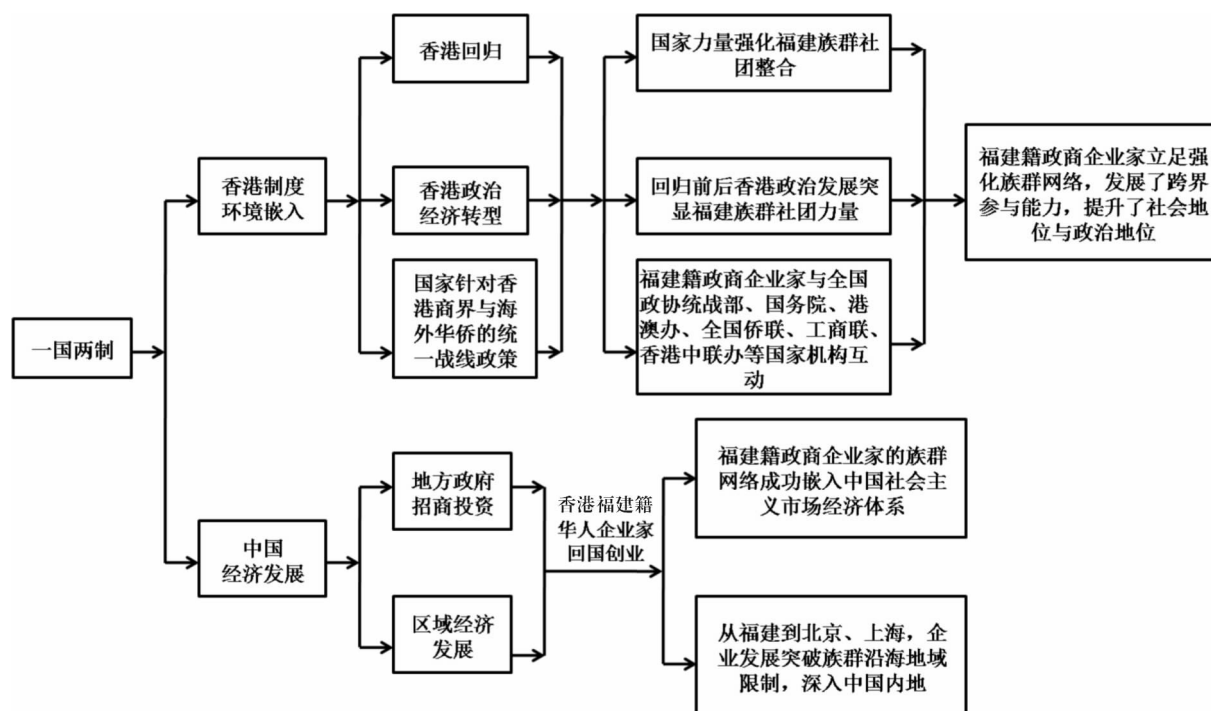


图3 香港福建籍企业家的政商发展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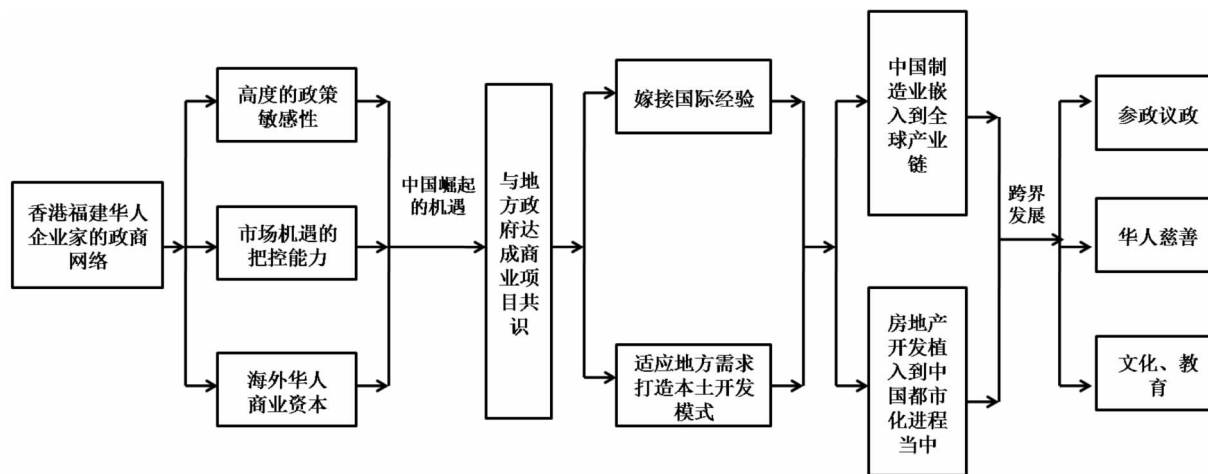


图4 香港福建籍政商企业的跨界发展与创新

四、研究结论与思考

回到本文所要探索的理论核心问题,香港福建籍政商企业家的族群网络与其跨界发展之间的关系。本文主要讨论了他们如何从香港这样一个国际大都市的外来移民,逐步克服边缘化的身份障碍,通过创业来实现向上的社会阶层流动。族群网络构建的过程包括了族群利益、族群文化、宗教等与国家权力的复杂博弈过程。族群网络所链接的不仅仅是文化认同和宗教认同上的无数个体,而且是结合了整个群体更大层面的经济与政治发展的需求。跨界活动对于移民企业家而言,同时具有经济和政治的双重作用,促使他们在不同的政治体制与市场体系

之间,取得企业经营上的成功。对于有族群背景的华人企业家而言,在创业阶段家族联系与同乡网络是他们获取创业资本的主要来源。面对不稳定的商业环境与激烈的同行竞争,家族的血缘关系、同乡的商业信任与族群网络的资本,帮助华人企业家渡过难关,并得以生存与发展。但这种族群网络内部的信任关系,在商业上也并非完美的设计。在华人企业成长壮大的过程当中,往往需要建立跨族群的商业联系,并与跨国企业合作。趋向保守的族群网络与家族关系,有时会与华人企业家在创业过程当中的跨界发展努力形成冲突。当香港回归中国,成为一个中国的国际城市之时,香港带有华人族群色彩

的资本与商业网络,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27]。他们利用地缘认同、家族网络与社团组织等具有鲜明族群色彩的网络关系,在中国与香港的政治经济变迁中,成功地构建了跨越族群界限的政商关系网。在中国崛起成为世界工厂之时,中国的国家角色与华人企业家作为跨国商业网络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变得更加复杂^[28]。在中国制造与华人制造之间,华

人商业的全球身份认同也发生了改变。这种变化源于中国国家发展与华人商业拓展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互动。当代香港福建籍政商企业家在中国经济发展与国内市场需求中,找到了合适的商业项目发展平衡点。凭借在族群网络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华人企业政商关系网,他们把成功的香港经验嫁接到中国地方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当中。

参考文献:

- [1] McKeown, Adam. Ethnographies of Chinese Transnationalism [J]. *Diaspora: 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Studies* 2001, 10(3): 341 - 360.
- [2] Ong Aihwa. *Flexible Citizenship: The Cultural Logics of Transnationality* [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3] Ong Aihwa. On the Edge of Empires: Flexible Citizenship among Chinese in Diaspora [J]. 1993(1): 745 - 778.
- [4] Hsu Madeline Y. *Dreaming of Gold, Dreaming of Home: Transnationalism and Migra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 China 1882 - 1943* [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5] Li Minghuan. *We Need two Worlds: Chinese Immigrant Associations in a Western Society* [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1999.
- [6] Kuah Khun Eng. *Rebuilding the Ancestral Village: Singaporeans in China* [M].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1.
- [7] Portes Alejandro, Luis Eduardo Guarnizo, William J Haller. Transnational Entrepreneurs: An Alternative form of Immigrant Economic Adaptation [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02: 278 - 298.
- [8] Portes Alejandro, Alex Stepick. *City on the Edge: The Transformation of Miami* [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 [9] Honig Emily. *Creating Chinese Ethnicity: Subei People in Shanghai, 1850 - 1980* [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 [10] Goodman Bryna. *Native Place, City, and Nation: Regional Networks and Identities in Shanghai, 1853 - 1937* [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 [11] Cochran Sherman. *Big Business in China: Sino - Foreign Rivalry in the Cigarette Industry 1890 - 1930* [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90.
- [12] Cochran Sherman. *Chinese Medicine Men: Consumer Culture i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13] Chung Wai - Keung, Gary G Hamilton. Getting Rich and Staying Connected: the Organizational Medium of Chinese Capitalists [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8.58 (2009): 47 - 67.
- [14] 周敏, 黎相宜. 国际移民研究的理论回顾及未来展望 [J]. *东南亚研究*, 2012(6).
- [15] Pan Chengxin. What is Chinese about Chinese Businesses? Locating the "Rise of China" in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8.58 (2009): 7 - 25.
- [16] 廖亦阳, 刘宏. 网络, 国家与亚洲地域秩序——华人研究之批判性反思 [J].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008(1).
- [17] 庄国土, 刘文正. 东亚华人社会的形成和发展: 华商网络、移民与一体化趋势 [M].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9.
- [18] Peng Dajin. Ethnic Chinese Business Networks and the Asia - Pacific Economic Integration [J].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2000, 35(2).
- [19] Dahles Heidi. Culture, Capitalism and Political Entrepreneurship: Transnational Business Ventures of the Singapore - Chinese in China [J]. *Culture and Organization* 2005, 11(1): 45 - 58.
- [20] Godley Michael R. *The Mandarin - Capitalists from Nanyang: Overseas Chinese Enterprise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1893 - 1911*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21] Sit V F, Wong S L. Small and Medium Industries in an Export - Oriented Economy: The Case of Hong Kong [M].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89.
- [22] Sinn Elizabeth. Xin Xi Guxiang: A Study of Regional Associations as a Bonding Mechanism in the Chinese Diaspora The Hong Kong experience [J]. *Modern Asian Studies*, 1997, 31(2): 375 - 397.
- [23] Wang Cangbai. *Re - Establishing Networks: Capital, Power and Identity in the Making of an Indonesian Chinese Community in Hong Kong* [M]. Dis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4.
- [24] 陈国贵, 陈惠云. 中港徘徊: 香港流动巡回企业家的故事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 [25] Goodstadt Leo F. China and the Selection of Hong Kong's Post - Colonial Political Elite [J]. *The China Quarterly* 2000, 61(1): 721 - 741.
- [26] Cheung Anthony BL, Paul CW Wong. Who Advised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The Politics of Absorption before and after 1997 [J]. *Asian Survey* 2004, 44(6): 874 - 894.
- [27] Chiu Stephen, Tai - Lok Lui. *Hong Kong: Becoming a Chinese Global City* [J]. Routledge, 2009.
- [28] Cheung Gordon. Made in China Vs. Made by Chinese: Global Identities of Chinese Business [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Jan 2009, Vol. 18 Issue 58, p1 - 5.

(责任编辑 程 苹)